

[RACHEL SIMON (美) 瑞秋·赛蒙 著 黄道琳 译]

RIDING THE **BUS** WITH MY SISTER]

彼岸的巴士

一对几乎毫无共同点的姐妹，一段不可思议的启发之旅

人民文学出版社

RACHEL SIMON (美)瑞秋·赛蒙 著 黄道琳 译

RIDING THE  **BUS**
WITH MY SISTER
〔
彼岸的巴士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5296 号

Riding the Bus with My Sister

Copyright: © 2002 BY RACHEL SIM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NE EDELSTEI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的巴士/(美)赛蒙著;黄道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ISBN 7-02-005239-8

I. 彼... II. ①赛... ②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789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刘 乔

封面设计:陈 楠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3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2.00 元

作 者 声 明

本书所涉及的一些人要求我改变他们的名字。为了尊重他们的意愿，并且免得读者想要区辨哪些是真实名字，哪些是虚构名字，我采取了一视同仁的做法；除了贝丝和我自己的名字之外，我将所有人的名字都做了更改。另外，我对故事发生地点的细节也做了变更，以便保护贝丝的隐私。



目 录

一月

- 旅程 2
降雪与悲伤之时 22

二月

- 上路 28
教授 32
闹脾气 44

三月

- 朝圣者 50
街头姑娘 60
追逐与逃离 70

四月

- 追梦的人 86
司机休息室 94
游戏结束 102



五月

- | | |
|--------|-----|
| 跟杰西吃午餐 | 114 |
| 媒人 | 132 |
| 追求幸福 | 136 |

六月

- | | |
|----|-----|
| 地母 | 142 |
| 残障 | 150 |
| 告别 | 162 |

七月

- | | |
|------|-----|
| 乐观的人 | 166 |
| 开球 | 178 |
| 消失 | 181 |

八月

- | | |
|--------|-----|
| 独来独往的人 | 184 |
| 无踪无影 | 199 |
| 不要害怕 | 200 |
| 泪珠之内 | 205 |

九月

- | | |
|-------|-----|
| 爱搞笑的人 | 210 |
| 手术 | 219 |



叛逆 226

十月

- 大块头 236
人的代价 245
回家吧,小女孩 250

十一月

- 少女好友 258
第十八洞 264

十二月

- 天鹅与女巫 278
双胞胎姐妹情 286
甭担心 289

一月

- 美景无限 292

一年半之后

- 创造奇迹的人 306

- 谢辞 310

一月





旅 程

“起床喽，”我妹妹贝丝说。“我们赶不上第一班巴士了。”

冬日清晨六点钟，月光还照在她的公寓里。她已经装束好了：深紫色T恤，淡绿色短裤，肩膀上还挂着一个紫色的小熊维尼背包。我好不容易才爬起床穿上衣服：黑色运动套衫，黑色保温裤。都已年近四十的贝丝和我相隔十一个月出生；除了年纪之外，我们可还有其他差异。她穿的尽是鲜艳夺目的衣物，她有办法在黎明之前倏地跳下床。她还是个有智障的女人。

我到这里来把生日礼物送给贝丝：我来搭巴士。

她自个儿住已经有六年了。住在这间由政府补贴租金，离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灰暗中型城市的大街有几个路口的公寓里，她大可过着天天一成不变的日子——自从丢了在快餐店清理桌盘的工作以来，她手上多的是时间。她可以领取政府发给的残障补助，生活费用可有着落。

但贝丝还有别的东西：妙点子。

大家通常不认为生活在社会视线边缘的人具有这项特质。像贫穷老人、未得到照顾的精神病患、无家可归的游民一样，贝丝是主流社会许多人难得想到，甚至看到的人。

搬到她的五楼公寓六个月后，她发觉生活孤单，而且已经看过了每一辑她看得下的“猜价格”和“我的孩子们”电视节目。于是，有一天，她有了搭巴士的主意。可不只是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搭巴士——不是她的辅导人在数年前教会她的搭乘方式。她想做的



不是从一个地点移转到另一个地点这种平常事。她要以自己的方式搭巴士。

贝丝回想，就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那天，出于不复记得的原因，她先从咖啡桌上拿起她的巴士月票。接着，她在高楼电梯内按下一楼的按钮，从大厅走到街上，在街角招揽下一辆巴士，朝司机那边爬上阶梯，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然后就从大清早到傍晚在市里绕了几圈，路线一条一条坐，巴士一辆一辆换。过不久，她每天会搭乘十几趟巴士，有的只有五分钟之久，有的长达数小时，车子在市内窄路和郊区丘陵行进时，她就跟司机和乘客攀谈起来。不出几个礼拜，她已经可以在半径十哩的范围之内来去自如；弄清楚车上人物如何因时因地而变，细读了巴士总站每周张贴一次的时刻表之后，她有办法推算出哪一天哪一刻哪个人就正在哪个十字路口。她把友情散布到城市的东西南北，组合起自己的流动社区。

贝丝的个案管理人并未建议她这么做，电视脱口秀“雷吉斯和李凯西”的主持人，甚至贝丝的男朋友都未曾这样建议。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我们急急往大街走过去，月亮渐渐没入建筑物后面。贝丝的一头鬈曲棕发在晨浴之后尚未干；我的这位向导这时向我指出候车亭上的路线号码，以及愠怒的司机脸上的不悦之色。她不戴手表，只凭来往的巴士判定时刻。

我们冲进市中心的麦当劳。才只是早上六点半，店里已经挤满早起的人：几群玩纸牌的老年人，独坐一桌低首读报的上班族。贝丝是不喝咖啡的，但她点了咖啡；服务员还没开口，她已经算好八毛四分的铜板递了过去。

然后，我们奔向屋外的黎明，急急走向一座候车亭。贝丝低头看着路面，像我带她去听唐尼·奥斯蒙演唱那一次那样吃吃地笑：



心情亢奋，得其所哉。她手里牢牢拿着她的黄色收音机以及一大把钥匙圈——依她算，总共有二十九个——钥匙圈的附挂物有甜饼怪、笑脸、和平标记，全部却只串了两把钥匙。她用指尖敲打着加上护套的巴士票卡，卡片上贴纸的号码是 000001。她每个月去换票一次，总是第一个抵达售票窗口。那张贴纸是她的私人徽章，证明她是这些巴士路线的皇后。

我们要搭的第一辆巴士靠边停了下来。司机克罗德打开车门，仿佛是欢迎我们到他家做客。贝丝脚步橐橐作响上了车，拿咖啡的手直直往前伸。克罗德接过塑胶杯装的热腾腾咖啡，然后把四个两毛五铜板放到贝丝手里。“我们的约定。”他向我解释。

接着，贝丝转身迅速走到“她的”座位——这是巴士前段直排长椅上第一个位子，斜对着司机座位，让她得以最靠近司机。我在她旁边坐下。我住在郊区，自己没车不行，偶尔坐坐通勤火车；这可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坐市区公共巴士。车子上路；我们经过劳工阶级的连栋排屋、一家出售基督教主题草坪饰品的商店、一座农贸市场、一间废弃的糖果工厂、几家亚洲人开的杂货店。克罗德的司机帽下露出刚开始转白的短发。贝丝宣布说他今年四十二岁，生日就快到了。贝丝讲出准确日期，又说他喜欢怎样过生日时，他边听边笑着。“她什么都记得。”他说。

他问贝丝，如果像气象预测所说的，温度由凉变暖，她会不会换穿平底拖鞋。“还用问，要系（是）超过五度，”她回答，“我就换了。”他告诉我说，如果巴士上没有其他人，他们会打开贝丝的收音机，一起“即兴演奏”。“可真大声。”她加进来说。他们回想起几个月前跟一位乘客闹不愉快的事。“她真坏。”贝丝愤慨地说。克罗德表示同意，然后谈起那次口角的经过：有一位乘客强烈认为克罗德搞不清后续的停靠站，直到那位不满的乘客下了车，他可庆幸贝



丝也在车上——总算有个人可以陪他一起叹气。

过不久，我们遇到骑单车的贝丝的男朋友。杰西也是有智障的成年人；他在行人穿越道前停了下来，淡棕色的脸孔直对着前方，失明的左眼在光线下透出乳白色，阳光在贝丝许久以前劝他戴上的头盔上反射着。他们在一起的十年，都超过了他们各自生命的四分之一。克罗德拿起对讲机麦克风叫着：“喂，杰西！”杰西朝我们看。我们在座位上扭转过去；我们向他挥手，这时他蓄小胡子的脸现出了喜悦。

一整天下来，不管我们搭上雅各的、艾丝特拉的，或是罗多夫的巴士，每位司机都热情地向贝丝打招呼。他们告诉我，她不时会帮上忙：在他们有一阵子没开过的路线上，她会提醒他们在哪里转弯；教他们唱收音机节目里的前十名歌曲；向他们报告路线时刻及工作人员的最新变化；他们生病时到医院探望他们。她也会帮助同车乘客：告诉他们怎么前往他们的目的地；巴士因为并排停车的送货车而无法前进时，跟着他们一起着急；帮他们把第三个购物袋拿到人行道上。

相对的，许多乘客会笑着跟她打招呼，问问她的近况；许多司机态度殷勤，甚至亲热。雅各问：她是否有了新的冬季大衣，上个月跟她起冲突的那个女游民有没有再烦过她；杰克塞了一些钱给她买汽水；伯特用破嗓子唱歌博她一笑。

倒不是每个人都对她好。我得知，有些司机称她为“讨厌鬼”。他们一看到贝丝在前头的巴士站，就直直盯着路开了过去。有些乘客瞧见她在人行道上等车，还会向司机提出预警，叫道：“不要停！”要是她上了车，他们会当着她的面不耐烦地说：“闭嘴！回家！”

“我不在乎。”她说，接着耸耸肩膀。我们由小长大时，每当有小孩用恶毒的字眼骂她，我总会在她脸上看到剧痛的表情；有时



候，那痛楚要经过几个钟头才消失。如今我看得出，处在朋友当中，她可以迅速恢复镇定。

我发现，改变的还不止于此。贝丝以前是个任性的小孩，她也像许多任性的小孩一样，在家里觉得最安全。现在她已经成长为非常外向、不顾俗套的大人：她利用时刻表交朋友，对别人的白眼置之度外——还有，她依自己的节奏东蹦西跳的样子，那可真是一记当头棒喝，叫人不会再认为智障就等于迟钝。我妹妹（我妹妹！我暗地里感到自豪）在这世界上来来去去，她所表现的信心不亚于在展览室里气定神闲走动的博物馆馆员；她非但不会因为与人有异而自怜自艾，她还为此感到得意。

那天下午，当我下到人行道，隔着巴士车窗向她挥手道别时，早上才发生的一个景象突然鲜明地在我脑中浮现。当时她正轻快摇摆着矮胖的身子要过街到麦当劳，我三步并作两步跟在后头。在黎明前的月光里，她喋喋不休地说着我们要搭乘的复杂路线——她心里相当明白，这世界上没几个人，甚至根本没人像她那样，整天看的是巴士的下车铃拉绳，闻的是汽车的废气——这时她无意识地把头往后一仰大叫道：“我不一样！我不一样！”仿佛是向天际之外提出挑战。

有生以来，我要到哪里，轿车、火车、飞机就把我送到哪里，我也自认为这样跑来跑去跑出了一点名堂；我加足马力，心想，前面就是功成名就。功成名就，样样了不得。那到底会是什么景况，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我亟想超脱我视为狭隘的生活：那种生活中有朋友，有家庭，有一份让我收入过得去的稳定且体面的工作。虽然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许多人感到心满意足的日子，但我不以此为足。

然后，三十九岁那年冬天，我跟妹妹搭上一辆巴士，这才发觉



我要的是比样样了不得的日子更宽广更深远的东西。

当时，我以为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已经出版了几本书，在大学有教职，开了几个私教班，替《费城询问报》撰写评论外稿，在一家书店主持节目。我对每件工作都感到自豪——这是我认识的许多人做不到的。

问题是，虽然我不愿向自己承认，我却没有停歇的时候。每个礼拜七天，每天从早上七点扯开被子到半夜一点又瘫回被子里，我就照着日程表像兔子般一步一步跳下去：写文章→改学生作业→为报社做访问→替书店安排作者签名会→上私教班→写写下一本小说的纲要→吃东西→垮在床上。

我告诉自己，我的生活跟商业体制下美国人的生活大有不同。毕竟，我要做什么都由自己决定，我在桌前工作时穿的是舒适的保温裤和套衫，只有开车去上课或到书店时，才用得上那几件 A 字形连身裙和上衣，才用得上口红。要舒解一下么，我兴致来时就来一趟快走，这还让我五呎高的身材保持着好模样呢。这是在骗谁？我还不是跟我的大多数同侪一样：过度忙碌，过度挑剔，过度紧张。

就这样，一周下来，原本可以见见朋友的，我却把所有空间封闭起来；就这样，我失去了许多朋友。也因此，几乎所有休闲活动都跟我无缘：我不看电影，不看戏；虽然我还会购买新出版的小说，只要在学校的“免费赠送”书架上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书，总会抱一大堆回家，但这些书都积了厚厚的灰尘，因为我只有时间读寥寥几本跟工作无关的书。要说的话，最大的损失应该是爱。自从我和那位长期同居的爱人双方哭哭啼啼不情不愿地分手以后，四年之间我只有几次尴尬的晚餐约会；到后来，连这种勉强安排的机会也不再有了。独处在费城郊区的公寓里，大多数晚上就在书桌上用餐，这当中我有时会看看征友启事。我翻翻日程表，想到没时间去



跟人喝咖啡，于是，我又忙起工作来。

我可不是一向这副模样。落得自个儿住之前，晚上我总要忙着赴这场宴会，赶那场首展，除了这里那里的读书会，还得跟我的女性好友在电话中聊上两个钟头。当然，要是我的男朋友山姆在家陪着我，这些事就甭谈了；我们会在沙发上轻松聊天，书啦、政治啦、多美好的样样了不得的日子啦，东扯西扯一番——这可是停不了的，若不是山姆不时要起身到他那一大堆唱片中翻寻，找出迈尔士·戴维斯或英国民谣歌手尼克·德雷克的东西来，放到唱机上播放。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什么时候开始生变；我只知道，当他向我求婚时，我竟不敢答应。最后，我认定应该让他走自己的路，于是在几分淡淡的哀伤和惋惜之中离开了他。我只拿走必要的东西——电脑、书桌、衣服——住到一个又一个廉价出租房间，试图为自己的日子理出个头绪，想搞清楚我是不是真的那么无情。惨的是，先前几年之间，我都是靠着山姆的建筑师薪水外加我的写作收入过活；如今，运道不佳，就那么祸不单行，这两个源头都突然枯涸了。自己一个人住的头几个月，我寂寞透顶，穷得可以，晚上胃总会不舒服，害我在充气床垫上紧紧抱着枕头醒过来，然后就躺着，一直到早上都无法再入眠。白天里，我看到电脑屏幕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看到的只是失败，这时我会发觉脸孔因为恐慌而紧绷了起来。

最后，我到一家书店工作；同时，大概是时来运转吧，我也开始在《费城询问报》发表文章。后来，支票簿里的余额不断增加真叫我觉得不赖，每刊出一篇报纸专栏或是在书店里得到掌声都令我觉得样样了不得的日子在望了，于是我又接了几个教职。我租了一间公寓，买了一张真正的床；不过，我倒是把音响和电视给省了，因为没这两样东西我还过得挺好的，就不必买了。我忙着工作。



我工作到筋疲力竭，要是半夜醒来也会立刻又睡着。我工作，直到忘了寂寞，直到无法设想任何别种存在方式。

我已经两三年没见过贝丝。我们藉书信保持联络；每个礼拜我写一张卡片寄给她，她则一连回我十五封信。她每封信只有占满整张纸的两三个句子，每个句子有好几个大写字母，到处都是句点；她把信纸折好，装进贴了好几张艳丽贴纸的信封，斜着方向写出地址。单单一天就在信箱里看到好几件这种礼物，那可真叫我心喜。这些用荧光笔涂写的信有时谈到我们的弟弟，（我很高兴麦克斯。买红色新车。他带小孩看我。很棒。）有时谈到我们的姐姐，（罗拉送我。礼物。沃尔玛买的。）或是告诉我最新的前十名歌曲，（你喜不喜欢。超级男孩的《我想要你回来》。我喜欢。）或是告诉我杰西在运动方面的最新成绩。（杰西有参加。那大赛。哇。）我最欣赏的是，这些信署名“酷贝丝”——看到信尾这个大刺刺的宣示，大家可不能再把她当做单纯的笨蛋了。

但是，当我偶尔打电话给她时，我们的交谈总是不自然又无趣。她从不主动谈她的情况；要是我透露了一点点我自己的事，她也没反应。她这一方面谨慎寡言，一方面兴趣缺缺的态度让我觉得不是滋味；家里其他人也有同感，跟他们一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问什么。说完“喂”之后，我们很快就没话好谈了。最后，我只好摆出我熟悉得很的“我是大姐你是小妹”架势，有气无力地说：“那家速食店有免费的忍者龟马克杯可以拿，你知道吗？”“你跟妈谈得怎样？”这样一句，我们可以勉强再谈个几分钟，贝丝那头传来零零碎碎，简短又没重点的话，我则告诉自己，好吧，这真无聊，但不会拖太久。挂断电话之后，我的肩膀就像刚打斗了一场那样僵硬。

有时候她会打对方付费的电话过来。“今天系我生日。你可以来看我吗？”或是“外头天气粉（很）好。你过来。”但她住在好几



个小时的车程之外，我对那城市不熟悉；她跟我们父亲搬到那地区时，我早已出外不住在家里了。要我到陌生之地搞不清东西南北团团转，又得忍受一番叫人吃不消的言语沟通？“抱歉，”我会回答她。“我没办法过去。”

此外，她还有这个……坐巴士的怪招；像家里其他人一样，我对这件事也难以苟同。有时候，这种怪透顶的事只叫我不知所以然；其他时候，想到她不找个工作好歹干点有用的活，却宁愿去把巴士路线弄得那么滚瓜烂熟，我就整个人沮丧难过。长久以来，我会喜欢小说里的古怪人物，对新闻报道的异类分子我也给予掌声，但贝丝对巴士那种独特的狂热太令我觉得不安，以至于我不愿去了解她的生活。事实上，甚至对那些得知我提到的三个姐弟妹之中有一个是智障者的朋友和同事——他们接着不外是问她是不是有唐氏症（没有），“心智年龄”有几岁——我也很少透露这件事。好一个心智年龄。仿佛他们认为一个人每天每日的心思欲念——以及识字水平、情感成熟度、时尚偏好、音乐品味、卫生习惯、言辞能力、社交手腕、情爱需求、常识——可以全部整整齐齐装进一个盒子，然后像小孩生日蛋糕似的在上面摆一个蜡制的7或13或3。当我说不出她的“心智年龄”时，他们会问她跟谁住在一起，纵令我已经说过她是一个人自己住。我这可就明白，他们心目中的智障者永远只是定型化的傻笑、天使般的小孩。这样的对话是那么像例行公事，而且那么多年下来老是一成不变，我原先的不安早就化为顺应；接下来，我也认清，我将永远在两个世界之间来来去去，一边是智障，另一边是“正常的”心智运作，而且我必须在两个世界之间传递讯息，却不完全属于任何一边。朋友们得知智障者也是独特的个体之后，似乎不再那么不自在。我不用去说贝丝究竟是怎样独特的个体，也落得松了一口气。